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含英咀华

——老浙大外语学科论文精选

◎ 任绍曾 殷企平 主编
胡 强 副主编

商務印書館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含英咀华

——老浙大外语学科论文精选

主　编　任绍曾　　殷企平
副主编　胡　强

商務印書館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含英咀华：老浙大外语学科论文精选/任绍曾，殷企平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ISBN 978-7-100-07503-9

Ⅰ.①含… Ⅱ.①任…②殷… Ⅲ.①人文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2276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含英咀华
——老浙大外语学科论文精选
主　编　任绍曾　殷企平
副主编　胡　强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03-9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3/8
定价：32.00 元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总序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会同浙江巡抚和地方士绅，积极筹备开设一所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要课程的新型学堂。经清廷批复，求是书院于1897年3月在杭州设立(1901年改为浙江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所新型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几经变迁，到1928年，成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杰出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出任校长，广揽英才，锐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名满东南。抗日战争期间，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艰苦跋涉，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一时名师云集，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1928年，浙大正式设立文理学院，开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心理、史学与政治等学科。1934年增设史地学系，1939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1945年成立法学院，后又陆续增加哲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类研究所。与求是书院同年创建的杭州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之江大学。陈独秀、蔡元培、陈望道、胡适、蒋梦麟、马叙伦、马一浮、郁达夫、夏衍、吴晗、胡乔木、施蛰存、郭绍虞、林汉达、经亨颐、汤用彤、谭其骧、劳乃

宣、邵裴子、宋恕、蒋方震、许寿裳、沈尹默、邵飘萍、梅光迪、钱穆、马寅初、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钱基博、张相、夏承焘、姜亮夫、朱生豪、王季思、严群、许国璋、王佐良、薄冰、方重、裘克安、戚叔含、李浩培、孟宪承、郑晓沧等著名学者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或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一度变为以工科为主的高等学府。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演变为杭州大学。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新时期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新浙大是目前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新浙江大学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目前，浙江大学拥有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方面，浙江大学更具有明显优势。为了有力推动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世纪之初，学校确立了“强所、精品、名师”的文科发展战略，从机构、成果、队伍三方面加强建设，齐头并进。《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系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未来，社会与人生，中国与世界，旧学与新知，继承与创新……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现，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必将以独立的思考，来回应社会、时代提出的问题。编辑这套《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正是为了记录探索的轨迹，采撷思想的花朵。

浙江素称文化之邦，人文荟萃，学脉绵长。自东汉以来，先后出现过王充、王羲之、沈括、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南宋后更形成了“浙江学派”，具有富于批判精神、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鲜明学术传统。浙江大学得地灵人杰之利，在百年发展史上集聚和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形成了自己“求是创新”的优良学风。《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库》将以探索真理、关注社会历史人生为宗旨，继承优良传统，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既推崇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之作，也欢迎沉潜精严的专题研究著作，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生共存，融会交叉，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是一套开放式的丛书，主要收纳浙江大学学者独立或为主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为了反映浙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做好学术积累，本丛书出版之初将适当收入一些早年出版、在学界已有定评的优秀著作，但更多的位置将留给研究新著。为保证学术质量，凡收入本丛书者，都经过校内外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精品”是我们倡导的方针和努力的目标，是否名实相符，真诚期待学界的检阅和评判。

同样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向以文化积累和学术建设为己任，盛期曾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前列，而今仍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重镇。浙江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

史。早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国立浙江大学丛书》。值得一提的是，浙大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一是高梦旦(1870－1936)，他1901年任刚刚更名的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次年以留学监督身份率留学生赴日本考察学习。1903年冬他应张元济之邀到商务，与商务共命运达三十余年，曾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倡议成立辞典部，创意编纂《新词典》和《辞源》，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老校长竺可桢，他1925－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主持工作，参加了百科词典的编写。在浙江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百年浙大和百年商务二度携手，再续前缘，合作出版《浙大学术精品文丛》，集中展示浙大学人的研究成果。薪火相继，学林重光，愿这套文丛伴随新世纪的脚步，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目　录

序 …… 任绍曾 1

东西方文化

安诺德之文化论 …… 梅光迪 13

卡莱尔与中国 …… 梅光迪 23

英文里的中国字 …… 佘坤珊 35

文学批评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述评 …… 蒋炳贤 55

文学研究

诗歌、散文

哲理诗人鲁克锐提乌斯 …… 鲍屡平 69

论《坎特伯雷故事集·总序》中的人物和人物描写 … 鲍屡平 125

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及译诗问题 …… 戚叔含 158

济慈叙事诗《伊莎贝拉》的分析研究 …… 鲍屡平 178

赫立克的人和诗 …… 佘坤珊 210

A BRIEF COMMENTARY ON HAZLITT'S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POETS* …… Bau Lüping 238

戏剧、小说

莎士比亚的性格 …… 佘坤珊 255
谈莎士比亚研究 …… 张君川 266
哈姆雷特的内在矛盾 …… 张君川 282
时代的风暴——论《李尔王》 …… 张君川 304
《麦克白》的悲剧性 …… 张君川 337
英国小说 …… 戚叔含 363
《劳伦斯评论集》前言 …… 蒋炳贤 375

语言研究

英语连锁疑问句 …… 李增荣 391
几组异名同译的文学词语辨析
——兼评《大俄汉词典》 …… 浥　尘 402
关于植物名词的翻译
——兼评《大俄汉词典》 …… 冯昭玓 416
全尾形动词时间意义的商榷 …… 李增荣 422

序

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闪耀着智慧光华的珍品——一组出自20世纪30—40年代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的传世之作，内容涉及中西文化，文学评论，文学中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研究，语言学中的词汇学、语法学和词典学。这是浙江大学的精神财富，是浙大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传统之所在。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编印出版这些论文，对我们后学来说，在敬佩仰慕之中，从中吸收营养，认真思考如何治学大有裨益。

SARS肆虐，足不出户，拜读华章，诸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在眼前，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学生时代，聆听教诲，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欣喜、感动和震撼。当你边读边思，有所领悟，受到启迪，不禁喊出“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你能不欣喜吗？当你看到先生们在广阔的学术天地里纵横驰骋，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你能不为他们的学识赞叹，不为他们为此付出的几十年“寒窗”乃至毕生的精力而感动吗？当你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与孔子哲学有关，英美建立文官制度时皆屡举我国科举制度为例，看到两千年前古罗马哲理诗人的思想为近代物理学家波伊儿和牛顿所接受的时候，你能不感到震撼吗？在这些著述中，先生们所论不一，风格也各异，但异中有同。这共同的显著特征似可概括为：博大精深、细致入微、探源求真，处处都透露出一种人文精神。现不揣鄙

陋，简述如下。

1. 博大精深

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博大莫过于论中西文化，不极上下古今、中西之功，难以涉足。泛论不易，专论更难，要论及两国至圣、泰斗当然就难上加难了。《卡莱尔与中国》一文中我们看到卡莱尔对孔子“屡屡称颂”，甚至为卡氏撰写传记的威尔生“喜以先生比孔子”。梅先生不以为然，曰：“孔子至圣，吾人不愿与任何他人并提。然吾人至少可置先生于‘蓄道德而能文章’之韩文公欧阳公以及近代之曾文正公之列而无难色。”没有博大精深的学识，不了解在英国卡氏是与约翰生博士齐名，同为大师；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学问家，怎能作出这样的比较“而无难色”？在《哲理诗人鲁克提乌斯》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广阔的画面。诗人凭借他的“科学思想、反宗教态度和诗才”，以长诗的形式传播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这就很自然地进入了文学和哲学以及哲学所统领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因而涉及人、人生和世界的深奥主题。论文论述到长达 6 卷 7400 余行的“咏万物之道”的性质和要义。内容严肃，卷帙浩繁，要想从中提炼出“用原子论的观点看宇宙万物”的要旨，没有广博的学识和坚毅的精神是绝不可能的。只要看一看论文的部分内容：认识论、科学思想、物质、天体、生物、心理，初民、神祇、死亡、自由意志、至善，就可以看出鲍先生学识之渊博。这里我们还仅就长诗的内容而言，尚未提及这种研究在语言功底和文学修养上的要求。《英文里的中国字》表面是探讨英语如何从汉语中获得借词，但实际上是讲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代表中国文化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输出到英国以后，不仅使英语里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现了“silk”“china”“tea”以及这些词的派生词，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现代英国的文化。余先生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瓷器不知不觉地给了西方200多年的美术教育，使他们从日用的器具里得到无限的美感。”“中国的茶对于帮助近世文明的发展有它不可抹煞的功绩！”中国字怎样进入英语，又怎样进入名家的著作，如何影响西方的文化，文中都有交代，显示了余先生对中西文明史深厚而透彻的了解。其他论文，如戚先生的《英国小说》、蒋先生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述评》、李先生研究英俄两种语言的语法论文、冯先生对大俄汉词典的两篇评论无不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2. 细致入微

梅先生曾说“凡治一学，必须有彻底研究”。彻底研究不仅要有深厚的功底，而且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这一篇篇论文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在翔实材料基础上的综合，也见到从不同方面着手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还有为突出人物性格或语言特征所作的比较。乔叟有两行诗：“假如他没有在某一本书里说过，他即在另一本书里说过。”(Introduction to the Man of Law's Prologue)大学问家往往如此。要了解他们的见解，就得在他们的著作里求索。

卡莱尔“于中国文化非有专门研究之人，更无祥瞻而有系统之论述”。然而，与“号称汉学家者”相比“盍有上下床之别”。那卡莱尔“值得介绍于中国人”的“一鳞半爪”的意见，梅先生从何得来？研读卡莱尔的大量著作。梅先生提到的《伟人与伟人崇拜》、《过去与现在》等五部，几乎是卡氏的所有重要著作。梅先生之研究不能不说彻底。在文学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文如其人，但莎士

比亚“总是把自己隐藏在幕后”,“宁愿化生为许多不同的角色,让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代表他个人的一小部分”。要了解莎氏的性格就不得不研究他的剧作和诗文。余先生根据莎氏剧作从幽默等四个方面揭示了莎士比亚的性格特征,功夫之深显而易见。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家不综观历史,兼收各家之言,就难以定论。对劳伦斯的评价就是如此。《劳伦斯评论集》前言就简述了对劳伦斯评价的错综复杂的历程,如何受到赞誉,作品被称为“字字珠玑的文学名著”,如何难“为大多数同时代人所理解、所接受”,甚至作品被斥为“废墟”,后来又如何获得承认,“跻身于英国小说伟大传统之列”。蒋先生引证了各家不同观点,如持肯定观点的利维斯、穆尔,持反面观点的爱略特,在社会意义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给劳伦斯作出公允的结论。语言的专题研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实际语言现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李先生的《英语连锁疑问句》和《全尾形动词时间意义商榷》都是从大量语言材料中引出结论的,显然也绝非一日之功。

文学作品的分析应该首先是语言分析。先生们的论文无一不是如此。现仅举一二例。且看鲍先生对《伊莎贝拉》的分析。先生点出了济慈利用篇章手段中的省略,如“不提洛伦佐被害的具体情况,把他留给读者去想象”;篇章中的重复,如“音乐,音乐”“回声,回声”“抬起你们的头……抬起你们的头”。不仅如此,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我想,假使 Malancholy 不是四音节词而是二音节词,济慈也会把它重复一次的。”这里先生对韵律和篇章手段同时进行了分析。鲍先生指出济慈利用语法中的同位语,如“‘蜜蜂’后面跟一个同义短语‘那些春日绿荫处的小讨乞’,马上使‘蜜蜂’生动活泼起来”;还有音律的使用,如“这两行诗充满了[m],[I],[ou]等声,

传达委婉、哀怨、呜咽、如泣如诉的思想感情”。戚先生在讨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指出:“And unfair that 即是 And that unfair,unfair 是动词”;“第 25 首中 unlook'd for 是分词,joy 作动词用”;“129 首中 Lust in action 是主语”等等。试想,若没有这样的分析能真正读懂英诗而加以研究吗? 比较是研究的一种方法,先生们也常常使用。张先生总是通过比较突出人物性格,比如在讨论哈姆雷特的心理状态时,他援引了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思考过程,但丁在《神曲》中写他灵魂的探索经历,甚至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的情绪比较;在讨论《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他引用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作比较,等等。这就将莎剧的人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但不具备中西文学的功底,审慎的思考是无法做到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 154 首之多,对之研究要下多大的功夫可以想象。戚先生对这种诗的沿革作了探讨,从社会和语言特征上论证了十四行诗为何采取这种形式。在阐述格律时,戚先生将十四行诗与中国古诗作比较,通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显现十四行诗的诗律,可见先生诗学功底之深厚,治学之严谨。

3. 探源求真

科研的目的在于求知、求真,在于通过不懈的努力,根据一定的理论,利用恰当的方法,不依傍他人,独立探求新的知识。梅先生说:“盖谓求真之法,在审慎与客观二者。审慎则观察事物务统观其全体,是否利害之真相,皆折中至当,而后发为定论,非潦草塞责、卤莽灭裂者所能为役也。客观则不参成见,不任感情,而以冷静之头脑,公平之眼光,以推测事理。See things as

they are."先生们毕生治学皆实践这一原则，不断求索，所以他们的论文富有真知灼见。就文学而言，研究者的任务在于揭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以及作家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语言体现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鲍先生在研究哲理诗人鲁克锐提乌斯的长诗时探讨了诗人的思想渊源和艺术渊源。思想渊源是伊壁鸠鲁的学说，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艺术渊源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他的长诗形式源于"咏自然"，但他也得益于荷马史诗。为了证明这一点，鲍先生列举了鲁氏长诗中若干描写的出处，如"金绳"典故(ii. 1154)，就出自《伊利亚特》(viii. 19)，他诗中的 ii. 24—25 一段就是从《奥德塞》vii. 100—102 借来，此外还有许多。如此追根索源，证据充足，结论就不由得你不信了。余先生为了说明中国字进入了英语，实际上是进入了英语的基本词汇，一方面提供了许多派生词，如从 China 就派生了 China-man, China-woman, China-paint, China-glaze, China-blue, China-hunter, China-fancier, China-closet；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词进入了文学作品，先生所引利用借词的作家有：罗马诗人维吉尔(Vigil 诗中用了 serres)，Sir Thomas Brown (pocellane)，Charles Lamb (china)，Mrs. Poizzi (china-ware)，Mrs. Gaskill (China-blue)，Pepys 日记(a cup of tea)，Alexander Pope(tea)，Chaucer(galingale)，Coleridge(Kubla Khan)，Gray (China's gayest art)，Milton (Sinaean Kings)，Ben Jonson(China-worm)。这些语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随着丝、瓷和茶叶进入英国，相应的词进入了英国语言，也影响了英国文化。在这篇论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 China 与"秦"有无联系，"契丹""支那"和"国泰"为何同义，"茶"为什么英文会有两种形式，teh 和 tea，等等。我们既可以学到实际知识，也可以围绕这些词了解中

西交流的一段历史。

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当然不能局限于语言分析。作品的形式、主题、人物都可以是分析的对象，也同样可以作出有见地的结论。比如英国小说为什么不用韵文，戚先生从时代的特征出发，说明“18 世纪是理性时期，同时也是散文时期，散文体的流行也就决定了小说的形态”。散文之所以流行，先生列了三个原因：政治宗教辩争，短文为有力之武器；周报、月报之类的刊物流行，宜于短文发表；读者群的增加，尤其是妇女读者的增加。读到这里，大概多数人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吧？就人物而言，乔叟笔下的 29 个人物，经鲍先生的分析，他们性别、地位、职业、性格的差异已不再停留在诗篇里，而成了有声有色（先生特地分析了“色彩运用”）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这不是增加了我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了吗？张先生研究两个莎剧中的悲剧人物——李尔王和麦克白，通过具体分析他告诉我们他们却是不同性质的悲剧人物，令人信服。张先生主张从文本和演出两个方面研究莎士比亚。这是因为文本的研究，如悲喜成分的交织，可以指导演出；而具体的演出可以提供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深化对剧本的理解。这是对莎剧研究的独到见解。基于大量语言材料的研究结论应该是有效的、可信的。李先生关于英语连锁疑问句的研究区分了连锁疑问句和链式疑问句，同时特别指出当疑问代词在疑问句中起主语作用时，不能用 that，这比一般语法书规定一律不能使用 that 显然进了一步，使这条规则更为准确。关于全尾形动词时间意义，李先生根据实例就其复杂性作了系统阐述，结论全面而明了，是对俄语语法的重要补充，对于实践也有指导意义。以上所述无一不是探源求真的结果，无一不是真知灼见。

4. 人文精神

细读这些论文总感到一股人格力量，这是因为先生们无论在作什么专题研究，始终在思考是与非、真与伪、善与恶、正与误、进与退、益与害的根本问题，始终坚持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信念。他们孜孜以求的是通过做学问体现人生价值，实现他们做人的原则。很自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看到他们的为人，感到一种人文精神。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先生们为什么会选择卡莱尔与中国、古罗马哲理诗人的长诗、乔叟的诗篇、莎士比亚戏剧、莎氏十四行诗、有争议的劳伦斯这些艰深吃力而未必讨好的研究课题呢。其实，正是从这些选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极为严肃的治学精神。就拿鲍先生研究《坎特伯雷故事集·总序》来说吧。先生虽然参考了现代英语的版本和中译本，但他坚持研读 F. N. Robinson 编辑的中英语(Middle English)版本，以求准确理解原著，而且先生不用现成的译本而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他所引用的诗行译成中文。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不正体现了追求尽美尽善的境界吗？读戚先生翻译的十四行诗，你会感到那似乎是取自什么经典著作的古诗，那确是诗！然而翻译中既要考虑原诗的内在含义又要推敲中国古诗的格律形式，绝非易事。然而先生做得如此炉火纯青，其中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先生乐在苦中，这不是一种精神在起作用吗？冯先生对俄语的权威词典《大俄汉词典》提出了批评，匡正了其中释义的错误，比如对 COHET 一词，词典的定义以意大利十四行诗为准，可例证却取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例证推翻了定义；又如，他指出我国的“桂冠”“桂皮”“桂花”三个词中的“桂”分别指三种不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